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回首中國三十多年來的劇變，經濟發展的奇迹固然令人震撼，但最令人迷惑的恐怕是國家的轉型。極權主義的模式顯然過時了，權威主義(或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似乎也不適用。西方發展政治學和社會學自1980年代以來興起了「把國家找回來」的熱潮，「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思路自此長盛不衰。要分析中國的大轉型，我們也應該借鑒這一思路。

——編者

作為社會問題的艾滋病

李楯的〈中國艾滋病政策：國際誤導與本土誤讀〉(《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一文，勾勒出中國政府在走向開放的同時，是如何在技術領域盲從西方和在政治領域謹慎保守，這個用「西方之眼」來看待與建構的中國艾滋病防禦機制在多方面顯示出了巨大的悖謬。比如在將吸毒與暗娼視為艾滋病傳染的主要渠道後，就開始「行為干預」這兩個違法的領域。

實際上，由於非法個體的具體處境根本不同，這種試驗田似的干預收效甚微。更遺憾的是，中國目前還沒有相對成

熟和獨立的公民社會，政府又不放權給非政府組織，公眾根本無法參與到艾滋病防治所必需的廣泛與持久的社會支持中來。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一樣，不當的應對機制是不能阻止其肆意蔓延的。由於貧窮而賣血的傳播渠道已經變得愈來愈主要，疾控部門針對吸毒與性亂的單刀直入已經陷入了沼澤地帶。現在需要的是疾控部門與性學家、社會學家等的廣泛合作，需要的是完善而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去全面深入、細緻長久地輔助與支援政府的單方面防治，最終需要的是一種全新的疾病防治理念與機制。或許，這種新的艾滋病防禦機制還是對當前中國體制弊端所作出的回應乃至啟示。

王威廉 廣州

2008.6.16

房地產市場的道德重建

讀王天夫、李博柏的〈從福利房到商品房：制度變遷與社會衝突〉(《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後，印象最深的是文末所引孫立平「利益交易時代已經來臨」一句。「利益交易時代」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是互利互惠。

但在當下中國，一方是強勢的房地產商，一邊是弱勢的購房者，相互地位的巨大落差使利益的天秤明顯向前者傾斜。

如今的房地產交易過程中，當購房者提出異議時，房地產商會以種種理由為自身明顯不合理的舉措辯解，而最不具有道德感的道德託辭便是「常規」。一切都得按「常規」操作，僅此一點就不僅讓初次置業者語塞，並且產生道德上的自卑感。這是房地產領域的諸多「潛規則」之一。

當然，道德問題的產生也與法律和機制的完善有關。房地產商的信誓旦旦之所以引起購房者極大的懷疑，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規則保證或辨識其言辭是否可信，更沒有關於失信後的懲戒機制。所以，面對房地產的一個基本現狀，購房者只好在道德上委曲求全，在質量上放低標準。

在「利益交易時代」，交易雙方的經濟地位可以不平等，但道德上卻不能不平等。因此，規範道德不是講購房者應如何自我約束，而首先是說那些居於強勢地位的房地產商如何自我規範。這固然有法律健全和機制完善的問題，但也是一個重建行業基本道德規範或職業道德的問題。

尤小立 蘇州

2008.6.17

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潘毅、任焰的〈國家與農民工：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一文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在自由市場和國家權威的規制下，作為中國當下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無法完成「無產階級化」。這與通常工業化過程當中必然伴隨着急劇的城市化，即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現象不同：一方面，市場要求勞動力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國家的戶籍制度，又阻礙農民工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使得他們無法在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享受公民待遇，這就造成農民工無法在城市中扎根或安居，也就無法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中國的農民工處在「半無產階級化」的狀態。

但是，作者忽視了政府強力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本身，恰恰使國家急於甩掉勞動力再生產的包袱(國有企業改革不僅使多餘勞動力失業，也使原有的諸多福利保障瓦解，更不要說房地產、教育、醫療的市場化改革了)。與農民工一樣，下崗工人同樣面臨勞動力再生產的危機。與農民工還有一份土地使用權相比，後者恐怕連農村也回不去。因此，與其說國家有意阻礙農民工的城市化，不如說自由市場綁架了國家承擔福利制度的責任，即使農民工完成了「無產階級化」，依然面對市場邏輯下被宰治的位置。在他們獲得市民身份的同時，也因失去土地而獲得聚居在城市貧民窟的可能，這離真正參與「市民化」的生活遠景相當遙遠。

張慧瑜 北京
2008.6.19

文章未能切中要害

中國三十年來的社會改革，面臨無數的政治、文化難題，其成因並非只是執政黨的問題，而是整體的社會文化轉變問題。趙月枝的〈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困境？——中國傳播政治的轉型〉(《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一文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共是十分有謀略的政治集團，對媒體的控制戰略具有十分精準的戰略企圖。

中國媒體的轉型與其說是社會政治策略，不如說是在改革和市場經濟大門打開後，經濟洪水沖決的結果。傳媒的轉型最根本的驅動原因是經濟利益訴求的結果，中共一方面要發展經濟，一方面要控制意識形態。兩種觀念像妖魔一樣纏繞着它，許多舉措都是被動的，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急就章。產業化的傳媒，必然對原來意識形態工具的身份形成破壞，媒體的利益訴求驅動，讓它們不斷觸摸政治底線。這種躍動是發散性的，管理者則是完全被動的，往往是現象出來之後緊急出台一些防禦性的強制措施。

建議作者最好回到中國做一番耐心的「田野」，相信再寫出的文章一定平實耐看，也能切中要害。

鮑昆 北京
2008.6.22

從集體化、極權國家到發展型、社會民主國家

姚洋的〈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蹟〉(《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一文在解釋中國

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奇蹟時引出了「中性政府」這一關鍵概念。實際上，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量的話，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國家模式的變遷，因為國家模式的選擇直接關涉到政府職能的轉換，對於中國特殊的「黨—國—府」關係而言，尤其如此。

中國國家模式的變遷經歷了從集體化國家、極權國家到發展型國家、社會民主國家的轉型。建國以來建立的高度一體化的集體化國家，其典型表徵就是，通過各種動員機制，國家建立起所謂的「命令性經濟」，通過這一套指令性計劃體制組織整個國家的生產。其權力終端卻是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核心。隨着集體化國家的發展壯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極權國家。極權主義國家不僅將經濟，而且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識形態等統統置於國家的巨臂之下，市民社會與私人領域完全淹沒在極權主義的滾滾洪流之中。改革開放以來，集體化國家與集權化國家始逐漸讓位於發展型國家和社會民主國家。

要是我們用這種國家模式變遷的視角來考察中國經濟奇蹟，或許更能夠明晰中國經濟奇蹟的內在邏輯。說中性政府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奇蹟，類似下面的問題恐怕姚洋教授難以自圓其說：難道政府本身不應該是公共利益、社會整體利益的代表？中國的經濟奇蹟恰是因為中國政府始終追求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而不偏袒任何集團？政府對待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就沒有任何差別？

阮思余 廣州
2008.6.23